



四川大学一流学科建设专项经费资助
优秀青年学术著作丛书

明清时期嘉绒藏族土司关系研究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of Rgyalrong Tibetan Chieftain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邹立波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四川大学一流学科建设专项经费资助
优秀青年学术著作丛书

明清时期嘉绒藏族土司关系研究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of Rgyalrong Tibetan Chieftain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邹立波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时期嘉绒藏族土司关系研究 / 邹立波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3

ISBN 978 - 7 - 5161 - 9594 - 9

I. ①明… II. ①邹… III. ①藏族—土司制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K28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555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称
责任校对 姜英臻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1.875
字 数 229 千字
定 价 9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001

- 第一节 研究旨趣：边疆研究范式下的西南土司 / 001
- 第二节 嘉绒与嘉绒十八土司 / 007
- 第三节 以往研究回溯与资料运用 / 022

第二章 嘉绒藏族土司的祖源关系 /032

- 第一节 “琼鸟卵生”神话传说：嘉绒藏族土司的同源记忆 / 033
- 第二节 象雄琼氏部落东迁 / 042
- 第三节 色琼扎、“圣王”与“族姓”：嘉绒藏族土司世系的多源性 / 050
- 第四节 苯教：嘉绒藏族土司祖源认同的纽带 / 063

第三章 明清时期嘉绒藏族土司的宗教关系 /075

- 第一节 昆珠扎巴的嘉绒之行与嘉绒藏族土司的关系 / 076
 - 一 嘉绒地方的苯教及其新发展 / 077





二 昆珠扎巴传记中嘉绒藏族土司的宗教关系 / 090

第二节 教派纷争中嘉绒藏族土司的关系 / 101

一 佛教在嘉绒的早期传播与赞拉土司的
宗教态度 / 102

二 18—19 世纪嘉绒佛苯之争与土司关系 / 110

三 司徒班钦与夏扎·扎西坚赞传记中嘉绒藏族
土司的宗教态度及其关系 / 129

第四章 明清时期嘉绒藏族土司的政治关系 / 139

第一节 嘉绒藏族土司的传统政治关系模式 / 140

第二节 14—16 世纪嘉绒藏族土司关系考略

——以董卜韩胡土司与杂谷土司关系
为例 / 148

一 15 世纪董卜韩胡土司势力的崛起与扩张 / 149

二 董卜韩胡与杂谷两土司之间的纷争 / 156

第三节 明清之际嘉绒地方的政治格局及其演变 / 165

第四节 嘉绒藏族土司的联姻关系 / 178

一 传统社会文化场景中土司的婚姻抉择 / 178

二 土司通婚抉择中的政治因素 / 189

第五章 中央王朝治边方略对嘉绒藏族土司 关系的影响 / 199

- 第一节 王朝权威初入嘉绒后的土司政治 / 200
 - 一 土司职衔对嘉绒藏族土司的政治意义 / 205
 - 二 嘉绒藏族土司关系中王朝权威的仲裁角色 / 214
- 第二节 清初土司政治秩序在嘉绒地方的重建及其影响 / 220
 - 一 清初土司政治秩序在嘉绒地方的重建 / 221
 - 二 嘉绒藏族土司对清初土司政治新秩序的反应——金川之役缘起的再审视 / 233

第六章 金川之役前后的嘉绒藏族土司关系 / 247

- 第一节 “以番治番”策略下的嘉绒藏族土司关系 / 248
- 第二节 杂谷事件与嘉绒政治格局的转变 / 258
- 第三节 九土司环攻大金川 / 263
- 第四节 第二次金川之役前后的嘉绒藏族土司关系 / 279
- 第五节 金川之役后嘉绒地方政治秩序重建中的土司关系 / 302

结 语 / 313

- 第一节 土司权威的建构与多重身份 / 315





第二节 由“外”而“内”：土司制度的地方实践与
王朝权威的地方角色 / 318

第三节 传统社会文化习惯在土司关系演变中的
弱化与土司关系的世俗化倾向 / 322

附录 嘉绒藏族土司世系 / 325

参考文献 / 353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旨趣：边疆研究范式下的西南土司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流行长达半个世纪的“汉族中心”史观已在西方学术界难以立足。美国“新清史”思潮兴起后，对“汉族中心”史观给予了彻底的反思和批判，将清朝的主体认知点从“汉化”转移到满洲本身，并竭力强调清王朝构建多元统治秩序中的边疆因素，突出内陆亚洲边疆对清王朝“帝国”建构的重要性。讨论主体的转变，得到美国学界研究中国西南边疆学者的普遍赞同和回应。他们也越来越不满于从单一的“大一统”格局创制来考察中国西南边疆历史，过分简化西南边疆自身政治基础和社会复杂性的传统研究范式，试图摆脱“汉族中心”史观的束缚，沿着“地方性策略”的逻辑，从边疆视角理解中国历史。土司制度是明清时期中国西南边疆最为重要的政治体制之





一。西方学者对土司问题的研究既着眼于“中华帝国”制度建设与西南边疆社会文化变迁之间关系的探讨，也强调边疆政治力量的能动性和边疆社会构建过程的复杂性。^[1]

西方学术界的边疆研究范式，为我们重新审视明清时期西南边疆的土司研究开辟出新的学术视野。实际上，近年来，历经百余年发展历程的中国土司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受到了特别的关注和重视，呈现出日趋繁荣的研究态势。在检讨和反思以往土司研究的学术演变脉络基础上，国内一些学者也越来越意识到土司研究仅仅局限于探讨土司制度和治边政策层面，存在自上而下的王朝治边史观的学术缺陷，而需尝试将土司研究置于更具广度和深度的研究框架内。就目前国内学界的研究范式而言，土司研究的新趋势可大致分为两种：一是系统地从学理层面思考和梳理土司研究的趋势，将土司研究提升到专门学的高度，力图在传统的土司实证研究基础上，扩展和拓深土司研究的内容和关注点。从单纯研究政治制度文化，延伸到土司的政治物态文化、政治行为文化和政治心态文化；从只研究中原王朝与土司之间的互动关系，拓展到研究土司与土司之间及土司与地方村社之间的关系上。借助多学科视角和多种文献资料，既保持宏观的研究视角，也逐步关注土司地方

[1] 彭文斌：《近年来西方对中国边疆与西南土司的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邹立波、李沛容：《西南边疆在明清史研究中的地位——美国现代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思想战线》2013年第6期。



社会的微观层面。^[1]二是将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视野从东南沿海移向西南边疆，以独特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阐释传统中国社会整合的宏大问题，即边疆地方如何整合进传统中国大一统的结构中，并在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实现高度的交织渗透。以区域为中心对问题的理解，促使部分学者认识到，过去对土司的研究，过于强调国家的主体作用，而忽视了地方历史传统的内在动力，倡议回到地方的层面，去理解中央王朝、土司势力与地方族群三者的互动关系。^[2]总体来说，前一种研究趋势是对传统土司实证研究的深化，研究视角具有逐渐向下而具体化的倾向，但着眼点仍在土司问题本身，与之相关的研究皆是围绕土司研究展开的。而后者的研究意图侧重于揭示更为宏观的学术议题，土司研究只是其探讨此宏观主体的组成部分。但是两者的研究范式存异而求同，在日益重视边疆区域视野上，与西方学术界存有相似之处。

然而，西方学术界在急于从多维度突破“汉”与“非汉”二元研究框架束缚之时，过分强调和夸大边疆的声音。

[1] 成臻铭：《清代土司研究——一种政治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观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成臻铭：《论土司与土司学——兼及土司文化及其研究价值》，《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李世愉：《关于构建“土司学”的几个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2] 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陈贤波：《土司政治与族群历史：明代以后贵州都柳江上游地区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为实现“去汉化”的目的，而对边疆同晚期“中华帝国”的对抗性冲突多有关注，甚至低估了明清时期边疆“非汉族群”对“中华帝国”施政策略的潜在影响力，及两者之间长期的依存互动关系。实际上，两者张弛有度的关系和“非汉族群”对“帝国”各种资源的反利用，能够从边疆地区土司的深入研究中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1]所以，西方学界的边疆研究范式同国内传统土司实证研究及区域社会史视角进行结合，取长补短，将对我们重新理解和修正晚期“中华帝国”历史及其与边疆的关系有所帮助。

基于此，本书的研究旨趣在于借鉴边疆研究的范式，改变以往单纯从中央王朝视角自上而下地看待中央与边疆地方关系的传统方法，关注边疆地方视角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强调土司研究应重视边疆土司自身的主观归属意识及其历史变迁，以及对“中华帝国”与边疆关系的潜在影响。

从概念层面看，土司研究与土司制度研究原本就是两种不同的范畴所指。前者涵盖后者，内容更为庞杂和丰富。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在边疆设置的一种特殊的地方性政治制度，对其进行研究，自然不能忽视中央王朝的视角，特别是对典章制度的了解和研究，应是土司制度研究的基础。但是就土司研究而言，在注重王朝制度和中央话语的同时，不应忽略边疆土司自身的内在能动机制。中央王朝与边疆土司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边疆土司对现实

[1] 邹立波、李沛容：《西南边疆在明清史研究中的地位——美国现代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思想战线》2013年第6期。



的政治秩序及其同中央王朝的关系，持有自身的一套思考逻辑。透过对这种逻辑的历史实证研究，可以探究和了解到边疆土司是如何在主观上认同和接纳被整合入传统的中国大一统结构中的。而且，作为边疆政治力量，土司与中央王朝又是一种在政治上相互博弈的关系。在处理具体的边疆事务时，中央王朝有时也是相当被动的，有意或无意地被包括土司在内的各种边疆政治势力所左右和利用。所以，如同学者姚大力所言，以往“中国自己的边疆史地学，多侧重于讨论历朝中央政府的治边策略与治边实践，而对边陲社会的回应还缺乏足够的注意”^[1]。本书的研究可以说是对此种缺失的尝试性弥补，也是对西方学界“边疆中心观”的反思和回应。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边疆地区有别于其他内地区域，往往具有一套异质的社会文化体系和“非汉族群”的主观归属意识。对边疆研究的重视，既可反观传统中国社会高度整合和多民族统一国家构建的复杂进程，亦可兼顾边疆在同中央王朝互动过程中影响政治文化发展的主体性地位。所以，有学者将边疆研究看作是可资期待的必需的研究领域，声称“意识到边疆的存在和清晰区分边疆的需要，是历史学家研究工作的必要前提之一”^[2]。本书研究的嘉绒，

[1] 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文汇报》2007年5月7日。

[2] Nicola Di Cosmo and Don J. Wyatt (eds.), *Political Frontiers, Ethnic Boundaries and Human Geographies in Chinese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3, pp.3-4.



在文化系属上被归入藏文化圈内，而又介于汉藏两大文明体之间。在西北甘青地区向西南云贵高原延伸的半月形土司带中，分布于青藏高原东缘、与藏文化联系密切的各土司同西南云贵高原的土司又有着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因而区域性视角俨然是推动中国土司研究深入的有利工具。这些土司区域共同构成了晚期“中华帝国”内部特殊的政治与文化边疆。嘉绒因其在藏文化圈及在清代边疆史上的特殊地位而更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本书具体的研究旨趣可分为以下四点：

一是通过系统的梳理与研究，较为全面地展现嘉绒藏族土司之间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本书将紧紧围绕土司关系这一主题，从几个主要层面，深入剖析嘉绒藏族各土司在外部与内部的各种历史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相互关系。二是通过考察明清时期中央王朝的治边方略，特别是土司制度对嘉绒藏族土司关系的影响，及各土司如何借助土司制度调整相互间的关系，反思土司制度、中央王朝与土司之间的关系、土司对王朝治边方略的反应和态度等问题。三是以嘉绒藏族地方性知识中的历史意识与叙事认知为蓝本，借助大量的藏文史料，并与汉文文献展现的史实相联系，突破传统研究中的王朝治边史观，立足于地方视野，更为全面地、多元地阐述嘉绒藏族的历史与文化。四是将嘉绒置于同内地与其他藏区的互动关系场域中，考察汉文明与藏文明核心圈对嘉绒的持续性影响，及其如何体现在嘉绒藏族土司关系的变迁中。



总之，以实证研究为基础，改变以往偏重嘉绒藏族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土司制度层面的研究取向，及从王朝治边史观看待嘉绒藏族历史的传统做法，立足于嘉绒藏族地方视野，以祖源、宗教信仰、政治关系、中央王朝与土司的互动关系等为主要研究内容，并结合个案研究，突出与阐释明清时期嘉绒藏族各土司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二节 嘉绒与嘉绒十八土司

本书所讨论的嘉绒是藏族的一个独特支系，主要分布在现今川西高原大渡河上游及岷江上游流域的西部，北界安多，西南邻近康区，东与川西平原毗邻。该区域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属横断山脉北段，北部靠近甘青高原，为地势平缓的高原牧区，向南逐渐进入高山峡谷区域，峰峦叠嶂，沟壑林立，地表崎岖破碎。地势险峻高寒，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落差较大。一日之间寒暖顿殊，咫尺之地阴晴各异。地类荒僻，山多田少。至清代，当地番民唯可种植青稞、荞麦等作物，以为生计，故物产稀少，人多贫窘。自汉代至民国时期，当地人多有于严冬时节邀结相携前往成都、重庆等地佣工谋生者，俗称“下坝”。

目前学界常常将嘉绒(ཇའོ་རྒྱལ)作为族群自称的汉文记音，过去又写作“嘉戎”、“甲垄”等。有关嘉绒的含义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藏族学者格勒



提出的嘉绒由来与墨尔多神山关系密切的观点。^[1]但在藏文文献中，“嘉绒”主要作为地域概念出现，是嘉莫绒（ $\text{ཇུལ་མོ་རེང་$ ）或嘉莫擦瓦绒（ $\text{ཇུལ་མོ་ཅཱ་འཇུང་$ ）的简写，有时也会被写作东方嘉莫嘉绒钦（ $\text{གང་ལྷགས་ཇུལ་མོ་ཇུཡི་རེང་ཆེན་$ ）。^[2]较早出现“嘉绒”称谓的藏文史籍是12世纪成书的《第吴教法史》和《娘氏教法源流》。两书均将嘉绒与8世纪“预试七人”之一的毗若杂那（ $\text{པེ་རོ་ཅན་$ ）联系起来，称其在吐蕃赤松德赞时代被流放到嘉莫绒，后在当地弘传佛法。^[3]但是早期藏文文献对嘉绒的记载相当简略，只是提到地名，而且常与位于现今西藏林芝察隅的南方擦瓦绒（ $\text{ལྷ་ཅཱ་འཇུང་$ ）混淆起来。故而，对嘉绒地域概念的考察，须结合汉藏文献的相关记载。

随着西南边疆地区开发程度的加深，明代中原人士对嘉绒区域地理知识的认知得到极大的拓展与扩充，而远胜于前代。明人对嘉绒的认知大致以毗邻内地的沿边土司为单位，在地名的音译方面没有统一的规范标准，往往音同字异，不易辨识。不过，此类文献隐含着不少嘉绒的地理

[1] 格勒：《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09页；彭陟焱：《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赞拉·阿旺措成是最早明确提出此种观点的学者。参见阿旺《略谈嘉戎语》，载《阿坝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政协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85年版，第2辑。

[2] 扎敦·格桑丹贝坚赞：《夏尔杂·扎西坚赞传》，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

[3] 第吴贤者：《第吴教法史》，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页；娘·尼玛韦色：《娘氏宗教源流》，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98页。



信息。其中,《明实录》对“伽木隆”的相关记载显得尤为重要:洪熙元年(1425)三月,“四川伽木隆之地妙智通悟国师朵儿只监藏并达思蛮长官司,各遣人贡马”^[1]。从洪熙元年到正统十年(1445)的20年间,《明实录》共载“伽木隆”或“加木隆”12次,主要是“伽木隆”地方番僧向明朝朝贡的史实。“伽木隆”与藏文文献中的“嘉莫绒”同为地域名称,读音极为相近,两者是否存有关联?总观《明实录》的相关记载,其中三处颇引人注目:

正统九年(1444)正月丁巳,“命刺麻班丹伦竹为灌顶国师,赐诰命。从四川加木隆宣慰司奏请也”。

同年八月辛亥,“命加木隆宣慰使司番僧耶捨朵儿只巴藏卜为净修崇善国师,赐之诰敕”。

同年十月壬子,“命刺麻耶捨朵儿只巴藏卜为净修崇善国师,给银印、诰命,并赐衣帽。先是,加木隆宣慰使克罗俄监祭言:‘哲兀窝寺在加木隆西北境外,富庶甲于诸簇,前此未通朝贡。有耶捨朵儿只巴藏卜者为众所服,今愿以土地、人民内属,乞与一名分委任之,必能效力。’且遣人导之入朝,故有是命”^[2]。

洪武初年,明朝在川西藏区三十六番诸部落中设置

[1] 《明仁宗实录》卷8下,洪熙元年三月,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262页。

[2] 《明英宗实录》卷112、120、122,正统九年正月、正统九年八月、正统九年十月,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2248、2421、2445—2446页。



都指挥使二、宣慰司三、招讨司六、万户府四、千户所十七。宣慰司是明代西南边疆地区武职土司中职衔较高者。川西藏区宣慰司三，指朵甘、董卜韩胡、长河西鱼通宁远，并无伽木隆宣慰司。^[1]前引正统九年十月壬子条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在提及伽木隆宣慰使时，此条史料亦载该宣慰使名为克罗俄监掣（དཀོལ་ལོགས་བྱུང་མཚན）。此名与当时董卜韩胡宣慰使名称相同。克罗俄监掣是董卜韩胡首任宣慰使喃葛（ནམ་མཁའ་）次子，正统三年（1438）正式受封为董卜韩胡宣慰使司都指挥同知，景泰六年（1455）病故。克罗俄监掣时代恰值董卜韩胡向外扩张之时，势力渗透至岷江上游地区。在正统至成化年间（1436—1487年），董卜韩胡一直被明朝视为蜀地边患，其影响延续至明代中期。

其次，正统三年（1438），明朝册封董卜韩胡喇嘛班丹也失（དབང་ཕྱན་ལེ་ཤེས་）为“妙智通悟国师”，此封号也与伽木隆国师称号相同。“喇嘛班丹也失”是董卜韩胡首任宣慰使喃葛长子。宣德五年（1430），应喃葛的请求，明朝以班丹也失为“刺麻”，领僧众。从明代对藏区番僧级别、封号的管理程度来看，在同一时期内，重复使用同一封号册封不同地区的番僧，是不大可能的。

[1] 朵甘宣慰司的辖区在邓柯一带，即元代的朵甘思路；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辖区东至泸定，西至雅砻江；董卜韩胡宣慰司辖地在今四川雅安市宝兴县。参见陈庆英《明代的甘青川藏族地区》，载《贤者新宴》，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辑。